

我的第一双皮鞋

◎ 周德顺

我穿衣服很随意,没有什么讲究,买什么穿什么,从来不挑剔,但是内心更喜欢穿西装、皮鞋。

上大一时,我有了第一件西装,是二姐请人做的;上大二时,我有了第一双皮鞋,是嫂子给我钱买的。

1988年,我考上了聊城师范学院(今聊城大学),家人很是高兴。二姐在集市上买了一块浅灰色带花纹的布料,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西装,我穿着它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那时的西装无论质量还是款式,都同现在的无法相比,但在那个年代,能穿上西装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件西装,我穿了好多年,都旧了也舍不得丢弃,因为它凝聚着二姐满满的爱。

第二年“五一”,哥哥结了婚。嫂子个子不高,但是很俊俏,爱说也爱笑。嫂子的到来,给我们这个冷清贫穷的家增添了些许温暖、生机。

哥哥和嫂子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

去学校看我,周末还让我去他们租赁的房子里吃饭。小屋不大,但很温馨。我大学同学都羡慕我有这样的好哥哥和好嫂子。

哥哥头脑灵活,工作干得好,还写一手好字。谁家有红白喜事,都会喊他去帮忙记账。

1989年临近年底时,哥哥说准备去街上卖春联,让我去帮忙,我痛快地答应了。

过了腊月二十,聊城大街上到处都是卖儿童玩具、卖小吃、卖春联的小商小贩。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汽车,在路边找个地方,只要不妨碍交通就可以摆摊。

卖春联的小商小贩主要集中在利民路南北两侧。绝大多数人是批发印制好的春联来卖,色泽光亮,价格也便宜,很受年轻人的喜爱。独有几位老年人是现写现卖,价格比批发来的自然贵不少,一些年龄较大的顾客以及书法爱

好者喜欢这样的春联。哥哥也加入现写现卖的行列,但是他是里面最年轻的。

哥哥借来一辆三轮车,又在三轮车上铺了一块大木板,用来放笔墨和红纸。哥哥现写现卖,生意比较好,摊位前围满了人,有挑选春联的,有咨询价格的,还有观赏哥哥写字的。我拿着哥哥写好的春联随便再找个地方摆摊,一天只能卖几元钱。

卖春联挣钱不多,但非常辛苦,天不亮我和哥哥就得冒着严寒来到利民路,晚了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摆摊了。中午吃饭也没个准点,有时候一天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天黑后收摊回家,嫂子做好饭,我们简单吃一点儿,又得接着忙活——哥哥写好一批春联,好第二天卖,我和嫂子帮着给字涂金边。忙活了好几天,到了腊月二十八,我和哥哥卖春联的钱加起来,仅100多元。

腊月二十九的上午,我要回老家

了。嫂子拿出30元钱,让我买双皮鞋,我推辞不要。嫂子说上大学了应该穿得好一点,我拗不过她,接过了这30元钱。

我兴高采烈地来到聊城百货大楼,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,我问了好几个服务员,才找到皮鞋专柜。我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皮鞋好,就随意选了一双黑色的,穿着感觉合适就买了下来。走出大楼,我来到一个修鞋摊前,给新买的皮鞋钉了一个铁鞋掌。穿上皮鞋,脚下发出“当当”的响声,我似乎又“长高”了不少,走起路来会不自觉地昂首挺胸。

回到家,父母听说是嫂子给钱买的皮鞋,特别高兴。邻居们看到我穿着皮鞋,也投来羡慕的目光,毕竟那个年代农村穿皮鞋的人少之又少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流淌,一晃35年过去了。我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穿皮鞋的情形,心里还美滋滋的。

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

◎ 刘孝鹏

每当路过东昌宾馆时,我都忍不住要往院里瞟两眼,看到一栋办公楼上“威海市商业银行”几个大字时,就会想起我以前在威海的那些时光。

2008年,我独自一人到威海谋生。每天晚上以及周末,在无亲无故的他乡,我就靠着每月一期的《青年文摘》和每天一份的《威海晚报》打发时间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我和《威海晚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有一天,我在《威海晚报》上看到一篇时评,读的时候感觉特别熟悉,好像是以前在哪里看过,于是就翻了翻自己制作的时评剪报本,还真找到了出处,再细瞅,发现竟不是同一个作者。

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,我就按照版面编辑留的邮箱地址写了个邮件,以热心读者的身份提醒编辑,审稿时多注意,大段的借鉴是不可取的。没想到的是,编辑竟然回复我了,对我表示感谢,并让我也试着写写。

那几天正赶上高考成绩放榜,全社会都在热炒高考状元,我就着这个话题写了一篇时评《请不要拿高考状元说事儿》。第二天,这篇时评竟然见报了,篇幅还不小。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、纸媒特别火爆的年代,我们单位每个部门都订有《威海晚报》,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同事们逐渐认识了会写文章的我。

当时,《威海晚报》有很多广告赞助,所以,第一篇文章发表后,我收到了50元稿费,还收到了一张同等价值的金龟饼代金券。我写作的兴趣更大了,专门琢磨了《威海晚报》各版面的内容和写作风格,没事就投稿,还注册了它的官方微博——海岬博客。后来,我每隔几天便有一篇文章发表,赚的稿费越来越多,收到的各种代金券

也越来越多,什么蜂蜜代金券、海鲜大礼包代金券,并且都不是满返的那种,而是无门槛消费。

在威海工作的那几个月,我和同部门一个与我年龄相仿、来自甘肃的小杨成了“饭搭子”。他带我走遍了单位附近的大街小巷,我带他吃遍了可以用《威海晚报》送的代金券支付的各式快餐。

回想起来,那可真是一段轻松快乐的日子。送走了2008年威海那个不算炎热的夏天,看过了北京那场异常精彩的奥运会开幕式,我去了刚果(布),小杨去了坦桑尼亚,自从离别后,我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后来,我听说小杨从公司离职了,在坦桑尼亚开了一家汉堡餐厅。再后来,又听说他的餐厅开得很大。不知道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小杨。

在威海的那段日子,我没事就在海岬博客上写一些略带伤感的散文。一位经常逛博客的副刊编辑注意到我写的文章,开始频频向我约稿,我的不少散文被选用。后来,我与这位编辑渐渐熟悉了起来,聊天的内容也从约稿变成了怎么更好地写稿。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,包括站在编辑的角度怎么选稿。

再后来,这位编辑知道我去了非洲,还主动找过我,让我工作之余多写写在非洲的见闻,她负责刊发,等将来写得多了,可以结集出版。刚开始我还挺兴奋,写了四五期,后来因为工作忙,再加上有7个小时的时差,交流起来不方便,就停笔了。现在想来,我也许错过了一个出书的好机会。

2014年,我回到东昌府区定居。如今十几年过去了,我还时不时回忆起在威海的那些时光、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手术室外的迎春花

◎ 刘晓东

岳父突然病重,我们带他去省城一家医院看病。医生检查完毕后,直接安排住院,并很快约定好了手术时间。

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,我们夫妻和大舅哥直接蒙了。老人平时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每天坚持游泳锻炼身体,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问题?是我们平时对他关心不够?但顾不上自责,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配合医生做好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上来。大舅哥更是天天在病房里陪护,几乎是寸步不离。

岳父做手术那天,我陪妻子一早赶到病房。看着憔悴的岳父,妻子眼圈都红了。老人安慰妻子说:“没事的,我很快就能回来。”当手术室的隔离门将我们的视线完全隔断时,我觉得浑身发冷,妻子更是不自觉地发抖。

好不容易在等待区找到座位坐下,我才意识到周围有好多的人。他们和我们一样,都有亲人在里面做手术。手术室外有几块显示患者手术进展情况的屏幕,屏幕上有上百人的信息在不断滚动,信息简单明了,只有名字、所在诊室和床号,却代表着一条条急需救治的鲜活生命。门外的人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盯着屏幕,看看亲人在手术室是什么样的状态。不时有人指着屏幕喊道:“快看,手术开始了!”就在这不断的喊叫声中,岳父的信息由术前变成术中。我本来就高悬着的心,更加紧张了,不停地祈祷:可别出现什么差错。妻子两眼直直地盯着屏幕,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襟,一句话也不说。

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,我们眼睛紧盯着屏幕,耳朵听着喇叭里的通知,护士时不时地呼叫某人的家属去谈话室。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妇女听到她的名字后,猛地一愣,慌里慌张地把手机、挎包、衣服往我怀里一塞,颤抖着声音说:“大哥,您帮我看一下!”还没等我答应,她就跑向谈话室。我抱着一堆东西,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妻子见状,说:“放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吧,都有个着急的时候。”几分钟后,那位妇女红着眼睛回来了,接过东西后向我们道谢。我问她情况怎么样,她含着泪说:“医生说手术很成功。”我看了看妻子,不由得又紧握了一下

她的手。

很快,喇叭里通知我们去谈话。妻子站起来就往谈话室跑,我看着她留下的一堆东西,犹豫着是否该和她一块儿进去。那位妇女说:“大哥,你去吧,我给你看着。”我感激地点了点头,转身就去追妻子。谈话室里,妻子和大舅哥紧紧盯着隔离窗那侧的医生,听他讲岳父的手术情况。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大声喘,只听见医生最后说:“放心吧,手术很成功!”妻子反身抱住了我,哭得像个孩子。

经过5个多小时的煎熬,岳父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。已经清醒的他,苍白的脸上绽放出笑容,并向我们举了举手,示意他很好。

我无意中瞥见楼下有一簇盛开的迎春花,它金灿灿的,看着让人暖暖的。春天来了,美好的事物都如约而至,愿世间万物一切安好。

